

试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特点

李 军 王 祥

摘要 孔氏家族作为世袭贵族,为天下范式,其礼仪制度独具特色。以曲阜为中心的孔氏家族是国家“尊孔”政策和皇家礼制的重要载体。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之产生,一是得益于鲁国历史文化的积淀深厚,二是得益于孔氏家族传统及其自觉性传承。随着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与封建君主主体制相结合,它所包蕴的周礼精神逐渐让位于礼仪的具体规程,从而失去了孔子那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特点主要有:典型性、系统性、政治性、依附性、脆弱性、超稳定性、两面性、家国文化同构性。

关键词 孔氏家族 礼仪制度 家国文化 同构性

中图分类号 K2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27(2018)05-0153-05

作者:李军,男,1976年生,山东沂南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山东财经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传统小学与经学。北京 100875;王祥,男,1971年生,山东兖州人,济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传统小学与经学。山东 曲阜 273155

孔氏家族之成为世界著名的文化世家贵族,这与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密切相关。孔氏家族最重要的职责是代朝廷祭祀孔子,“祭孔”是揭示孔氏家族长盛不衰的“钥匙”。中国古代历代皇朝均尊奉孔子之“道”,以守礼法、行仁政、实现天下大治相号召,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巩固其统治,这是历代君主尊孔的根本原因。为尊孔,就得祭孔。经过历代累积,以曲阜为中心的孔氏家族成为了落实国家“尊孔”政策和皇家礼制的重要载体;以祭孔为核心的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体系,亦成为王朝礼制的典范。皇权依靠礼制维护其合法性,孔氏家族依靠皇权和礼制而繁荣,两千年来,始终如此。

一、积淀深厚的鲁文化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以曲阜为中心的鲁国是中国早期文明时代重要的人文荟萃之地,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城东寿丘是传说中的黄帝诞生地,宋真宗尊黄帝为始祖,并曾在此建景灵宫祭祀。黄帝之子少昊为上古五帝之一,据说当政期间,天下大治,死后葬于此地。鲁国是周朝的同姓诸侯国之一,是著名的礼仪之邦。武王伐纣,建立周王朝,封其弟姬旦(周公旦)于少昊之虚曲阜,是为鲁公,属姬姓侯爵。周公因辅佐武王、成王而未就国,派长子伯禽前往曲阜即位为鲁公。周公功勋卓著,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得到了不少礼制特权。《礼记·明堂位》载云:“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

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①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相传周礼由他创制,虽然他并未赴曲阜就任,但他对于鲁地的礼制文化建设与发展,应该有深远的影响。鲁国虽是侯爵,却具备王制之礼的实物和礼制特权,这为鲁都曲阜形成良好的礼文化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

鲁国重视周礼的推广有其现实原因。鲁国立国时,很多殷人后裔居住在这里,孔子本人就是殷商贵族的后人。为了统治这些殷代遗民,伯禽利用礼制特权,依循“宗周模式”,将鲁国建设成为周王朝巩固在东方的统治的重要据点,其中的重点措施之一就是向他们传播宗周文化,极力推行周朝礼乐。周礼由周王室制订,而在具体实施时,各诸侯国一般是各取所需,因地制宜,唯有鲁国始终不忘祖述先王之训,《礼记·明堂位》说鲁国“礼乐、刑法、政俗未尝相变”,“天下以为有道之国,是故,天下资礼乐焉”^②。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尚礼民风,成为了周礼的完整保存者和实施者。直到司马迁时代,邹鲁之地犹有周公遗风,民风好儒,于礼完备,各国诸侯往往要到鲁国去了解周礼。《左传·昭公二年》记载:

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③

鲁国重视周礼的执行和传承,甚至拘泥于周礼而不思变通,这于政治统治固然不利,但对周礼的保护和传承却很有利。孔子从幼年起就生活在鲁国都曲阜,礼制色彩浓厚的鲁文化,为他人生理想的确立和礼制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环境,这自然成为了孔氏家族礼仪制度产生的人文渊源。

二、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家族传统

孔子的祖先是殷商贵族,是殷商礼乐文化的执行者,孔子的血脉里含有礼乐文化的基因。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家族传统。《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鲁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诫其嗣懿子曰“孔丘,圣人之后,灭于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让厉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兹益恭,故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敢余侮。’儻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其恭如是。吾闻圣人之后,虽不当世,必有达者。”^④

考父庙鼎上的铭文,是孔子祖先对后人的训示,“偻、伛、俯”和“儻于是,粥于是,以糊余口”,代表了一种谦卑的生活态度,符合礼的精神。祖先高贵的血统和尚礼的品质,为孔子和孔氏家族,也为家族的礼仪制度,打下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

孔氏家族正式形成于孔子,因此孔子的价值观对于家族文化的走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孔子继承了家族的良好传统,自小就对周代礼仪制度十分感兴趣,“常陈俎豆(祭器),设礼容”,经常做和礼仪有关的游戏。青年时代,更是努力学习周礼,“如太庙,每事问”;以郯子、师襄、老聃为师,向四方之人广泛学习礼仪,逐渐掌握了周代礼仪制度的仪规和精髓,青年时期就成了礼乐专家。对于恢复周礼,孔子具有远大的抱负。面对已经衰落的礼乐文化,孔子始终保持进取精神,坚持自己

①② 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57、857页。

③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126页。

④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1893页。

的理想,创立了以“仁”为核心观念、倡导“克己复礼”的儒家思想。在孔子之后的数百年间,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不断发展壮大。至秦汉统一之后,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古代中国的繁荣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孔子不仅是孔氏家族发展脉系的起点,更是其家族精神特质的引领者。当然,孔子尚礼的特质为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孔氏家族对礼仪制度的自觉性传承

孔子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理想主义者。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他为了实现恢复周礼的理想而周游列国,寻找从政入国的机会。他虽然处处碰壁,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终其一生,他的礼制理想也未能实现。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更多地投入到古礼的整理和教育事业中,将自己的礼制思想通过典籍和门徒传递下去,这对于儒家礼制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去古未远,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自己读到孔子的书,想像孔子的为人,曾经去鲁国观拜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见到“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这就是说,在漫长时代中,孔子后裔和门徒信奉孔子的思想,坚守以周礼治理天下的美好理想,并时时习礼不辍。自觉地习礼和传承礼,形成传统,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有着坚实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随着秦汉大一统后历代封建王朝实行全面的尊孔崇儒政策,孔氏家族的政治地位日益上升,孔子由思想家变成了政治偶像,其家族及其礼仪制度也随之与封建政治体制相结合,其礼仪制度的内涵逐渐发生了变异,所蕴含的周礼精神逐渐让位给了礼仪的具体规程,而失去了孔子的可贵的理想主义精神。李安宅在《〈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论及礼的功用时,以社会学家的独特眼光深刻指出“人是习惯的动物,不是理想的动物。”在孔氏家族内部,“礼已经变成了具体的操作,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必需,有如布帛菽粟,并不十分高远”^①。在习惯性动作中,孔氏家族及其主人自觉地扮演着“礼的执行人”的角色,凭着对皇权的虔诚,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得以习惯性延传。

四、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基本特点

以孔府为代表的孔氏家族是典型的封建贵族,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对孔子思想的实践性阐释和补充,其内容丰富而庞杂,具有典型性、系统性、政治性、依附性、脆弱性、超稳定性、两面性、家国文化同构性等突出特征。

典型性。在中国历史上,孔氏家族是唯一一个世袭罔替和不因王朝改变而衰落的贵族之家,具有封建大贵族的一切特征。经过历代皇权的检验和调整,孔氏家族形成了极其丰富完整的、适合封建专制制度需要的礼仪制度体系。无论是在与政权关系的体现上,还是在各种礼仪制度的可操作性上,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都具有典型性特征。剖析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对于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贵族发展规律具有典型意义。

系统性。孔氏家族所有的礼仪制度都围绕祭孔礼仪展开,涉及家族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丧葬、婚嫁、祭祀、修谱、族规,甚至建筑格局等方面,形成了独特而全面的礼制系统,内容极其丰富,礼仪制度的“家族特征”十分明显。孔氏家族依托系统性的礼仪制度,与历代朝廷进行直接对话,维持

^①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家族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政治性。这是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区别于其他贵族之家礼仪制度的主要特征。孔子思想被尊奉为国家正统思想之后,孔氏家族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受制于政权,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特征。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已经不单纯是礼的仪式,而是更多地体现为政治的需要,在体现家族特征的同时,深刻体现着国家礼制的特征。

依附性。政权决定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的价值走向,没有政权的支持,孔氏家族不会延续千年的繁荣;没有政权的需要和调整,孔氏家族的礼仪制度也不会如此完备。南宗让爵而被剥夺衍圣公特权之后,“子孙承祀掌管漫无统纪,衣冠祭仪混同流俗”^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对政权有依附性,同时更要为政权服务。代朝廷祭祀孔子,按时赴阙陪位祭祀,当好传承礼制的典范,是孔氏家族的职责所在,也是其礼仪制度的价值所在。

脆弱性。依附性决定了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的脆弱性,发生在乾隆年间的“孔继汾《孔氏家仪》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据孔继汾称:此书的撰写起因于衍圣公孔昭焕续娶咨问仪注,刻成于乾隆三十年,“不过记载家庭仪节,俗间通行之事,原不关系朝廷典制”;其自序中所谓“今之显悖于古者”一句,“说到底家庭现今行事有显悖于古昔祖风之处。凡书内古今二字,都是指今俗古俗,并非指斥今制有干违悖。”^②但孔继汾还是被乾隆钦点严厉查办。且不论告发他的孔继成是否别有用心,也不论清代“文字狱”政策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孔继汾忽略了孔氏家族及其礼仪制度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他主观上割裂了家族礼制和国家礼制之间的关系。当政权突然发难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脆弱的一面暴露无遗,孔继汾因一句“今之显悖于古者”而获罪,就是必然的了。可见,无论孔氏家族的具体礼仪制度多么完美,只要它稍不合于“朝廷之制”,就会被强烈打压。

超稳定性。虽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具有依附性和脆弱性,但是其又能够适应封建政治制度的需要,与历代封建皇权并行发展二千余年而不衰,这就是其超稳定性特征:封建政治制度不变,主流意识形态就不变,尊孔崇儒的政策也不必变化,孔氏家族的礼制当然就无需质的变化,因此孔氏家族礼仪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缺少深刻的制度性变革。当然这种超稳定性特征使孔氏家族获得了与任何皇权对话的资格,每次政权更迭,其只需要做出小范围的调整就能满足新皇权的需要。具备超稳定性特征的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

两面性。一方面,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是其家族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充满了温情色彩,协调了家庭与外界、家庭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代表了孔氏家族礼仪之家的形象;另一方面,作为封建贵族,其家族礼仪制度带有封建宗法性质,包括族规家训在内的所有礼制代表家族上层的利益,而以牺牲家族下层的利益为代价;孔氏家族的组织管理又把政权和族权结合在一起,位于“金字塔”尖顶的宗子衍圣公,维护的是政权和族权利益,他所颁布的族规具有家族法律的性质,甚至可以以家法代替国法处置户人和雇佣人员。因此,孔氏家族礼仪兼具家族温情与宗法残酷的两面性色彩。

家国文化同构性。孔氏家族礼仪制度蕴含着一种崇礼尚德而生生不息的文化,这与国家文化具有同构性。孔氏家族虽然以一个家族的形式出现,其礼仪制度却是通过以衍圣公为代表的一代代孔氏族人来实践和传承的,所以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既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礼仪制度,也蕴含着一种“家国同构”的崇礼尚德的文化,因为中国不仅政治上是“家国同构”,文化上也是“家国同构”。

^{①②} 张维华主编《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第二编全一册),济南,齐鲁书社,1980年版,第15,530页。

如乾隆元年(1736)衍圣公孔广燾见驾时,皇帝谕告曰“遵家训,即所以报国恩也。”^①所以,以衍圣公为代表的孔氏家族以家族礼仪制度为依托,崇礼尚德,约束族众,成为天下每个家庭忠君孝亲的道德典范。所以它们在政治与文化上共同形成了“家国同构”思想。

时至今日,虽然孔氏家族礼仪制度所依附的“家国同构”宗法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家国同构”的中华文化却绵延不断,孔氏家族“诗礼传家、崇文尚德”的文化已经成为千家万户家规、家训、家风的精神内涵,这正是中华文化“家国同构”性的体现,受到整个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华人的认可与传承,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信的现实依据与活水源头。

以孔氏家族为代表的家族文化、家规家训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家庭精神标识,包含着中华民族的深层精神追求,也是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家国同构”思想下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成果。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②“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③总书记的话深刻揭示出中华文化的“家国同构”性,揭示了培育良好家风、家规、家训和治理好国家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了建设传统优秀家风、家规、家训文化对中华民族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成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理论指导。

(责任编辑:公羽)

① 孔继汾《阙里文献考》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影印,第50页。

② 习近平《以千万家庭好家风支撑全社会好风气》,《南方日报》2016年12月13日。

③ 摘引自习近平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见《光明日报》2015年2月18日。